

邬国平 著

竟陵派

与

明代文学批评





竟陵派与明代文学批评

JINGLINGPAI YU MINGDAI WENXUE PIPING

ISBN 7-5325-3943-1



9 787532 539437 >

I·1746 定价：25.00 元

I2
W

竟陵派与明代文学批评

邬国平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竟陵派与明代文学批评 / 邬国平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10

ISBN 7-5325-3943-1

I. 竟... II. 邬... III. ①竟陵派—研究 ②文学评论—中国—明代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8267 号

竟陵派与明代文学批评

邬国平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 (1) 网址: www.guji.com.cn
- (2) E-mail: guji@guji.com.cn
-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青浦印刷厂印刷

开本 650×980 1/16 印张 16 插页 5 字数 300,000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25-3943-1

I·1746 定价: 25.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

目 录

竟陵派研究

- 一、竟陵派的崛起 / 3
- 二、竟陵派同志录 / 7
- 三、钟惺、谭元春与晚明党争的关系 / 15
- 四、竟陵、公安两派关系述略 / 26
- 五、从《花雪赋引》异文看袁中道与钟惺的分化趋势 / 40
- 六、钱谦益与钟惺关系论说 / 47
- 七、《诗归》成书考 / 60
- 八、竟陵派的文学理论 / 71
 - (一) 一个新的诗歌观念 / 71
 - (二) 改造二派,自成一家 / 83
 - 1. 信心信古 / 83
 - 2. 重情重理 / 91
 - 3. 求灵求厚 / 99
 - 4. 新的扬弃 / 104
 - (三) 《诗归》面面观 / 114
 - 1. 选诗的特点 / 114
 - 2. 论诗人、风格及诗歌创作 / 121
 - 3. 叙事诗理论 / 129
 - 4. 鉴赏批评的主张和实践 / 133
 - (四) 散文创作理论 / 144
- 九、钟惺佚作 / 149
- 十、谭元春佚作 / 151

明代文学批评论略

- 杨慎的文学批评 / 159
徐渭的思想及文艺观 / 175
李贽的思想与文学批评 / 184
汤显祖的诗文理论 / 194
袁宏道与江浙文化 / 204
民歌与明代文学批评 / 216

后记 / 229

竟陵派研究

一、竟陵派的崛起

竟陵派是晚明时代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像我国古代多数的文学流派一样,它是一种合诗文创作与批评为一体的“文学创作—批评流派”。它以钟惺、谭元春为领袖,由当时一批志趣相投的文人共同组成。钟惺、谭元春皆为竟陵(今湖北天门)人,因此人们习惯上称之为竟陵派^①。钟惺、谭元春资性聪慧,多才多艺。钟惺精于绘画,谭元春擅长书法,尤善狂草。他们除创作了大量诗文外,还下过大功夫评点古籍,著述颇富。

十七世纪初,竟陵派崛起于今湖北省江汉平原,并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思想文化背景的。

当时,中国封建社会已经步入晚期。明皇朝官僚集团内部矛盾重重,纷争激烈,统治机器锈迹斑斑,运转不灵,朝廷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的维系能力逐渐减弱,全国呈露出某种失控的现象,这使社会的局部地域成为了思想文化相对自由和活跃的场所。

早在十六世纪初,王阳明创立了心学一派,与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构成异差,使思想学术界发生了一次大的变化。尽管早期王学的实质仍然是减抑人欲,维护封建统治,但其中包含着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可以从中引申出的——重视个人主体精神的内容,在客观上对晚明的思想解放起到了引发作用。“讲良知者盈海内,人人得而闻之。后生者

^① 竟陵县建置于秦朝,五代后晋天福初,为避讳而改名景陵,宋、元、明及清初沿用。故明末清初的文人又称钟惺、谭元春的创作为“景陵体”、“景陵风”。

起,不以良知无不知,而以所知无不良,或有杂于见,起随便之心,而概以为天则。”^①所谓“以所知无不良”、“随便之心”、“为天则”,恰好是当时自由的个人主体精神得到张扬的征迹;与此同时,人们对先哲和故纸的崇拜乃至迷信正在渐渐地减退,代之以重视个人的自由思考和寻求独特的发现。

这一时期,我国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一带的城镇,商贸活动增加,随之而来的是,市民阶层力量的增强和市民意识的弥漫,这必然引起传统的价值观念发生变化,世俗化倾向渐趋突出,“今有欲者满天下,而求一人之几于中节,不可得也。”^②相对于人欲抬头,天理观念慢慢地淡薄下去,这是自然的情势。

个人主体精神和市民意识相互交汇,形成一定的新的思想环境,这给予当时的文坛以很大影响。前后七子、公安派(包括一些先驱人物如李贽、汤显祖等)、竟陵派,还有一些不入派的文人如祝允明、唐寅、文徵明、杨慎等,他们在具体观点上尽管存在着种种不同,甚至有严重的分歧,并且由此而引起了长时期的激烈争论,但是他们在反对程朱理学,肯定主要是反映市民意识的民间词曲、通俗文学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方面,又都基本相一致。就此而言,上述诸家诸派都是汇成明代中、晚期进步文学潮流的涓涓细水、滔滔洪波,共同属于当时新的思想文化背景的产物。

再从具体的诗文创作和批评的情况来看。朱明皇朝建立后,做了大量恢复和健全“先制”的工作,全国充满一股复古的气氛。这势必会在文学风气中反映出来。宋濂提出文学的出路在于师古(《师古斋箴序》),林鸿倡扬以盛唐诗歌为“楷式”(引自《唐诗品汇凡例》),都是很有代表性的意见。李东阳的意见稍有变化,他反对一味模仿而失自己真情,但同时他也突出地强调学习唐音、唐调,在学古和写真之间仍摇摆不定。自李东阳后,明代的诗文派系门墙渐严,各自的主张都以偏激为特征。前后七子大力提倡散文宗先秦、西汉,古诗尚汉魏,近体学盛唐;唐宋派积极倡言写散文以唐宋大家为规范;公安派则强调文学创作应当信心信手,“独抒性

① 徐渭《奉赠师季先生序》。

② 徐渭《逃禅集序》。

灵”。在各派的理论中,文学创作的学古和创新未能有机地、有效地结合起来,学古者或陷于拟古而未能自拔,信心者或流入草率而不足自高。如何克服上述理论的偏颇,产生一种新的具有“合力”作用的理论,已是文学发展本身所提出的一个亟需回答的问题。

钟惺、谭元春在领受新的社会思潮冲荡的同时,对当时文坛所面临的这一问题作了思索。他们开始是走模拟的一路,未能满意;后来,转而走信心的一路,也未能满意。他们不得不对此进行反思,在总结各派的利弊短长和自己早期创作的教训基础上,终于认清了融合两种创作主张的必要和可能。同时,他们对诗文创作和欣赏方面一些别的重要问题也进行了探讨,这些都构成了竟陵派文学理论的突出内容。概括起来说,竟陵派文学理论的主要贡献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诗歌观念上,提出了诗为“活物”的理论,从而为诗歌的鉴赏和批评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

二、对明代文学批评激烈争执的双方(前后七子和公安派)的理论力求扬长避短,在此基础上铸成自己一家之说,成为明代文学批评流派中理论内容充实的一派。

三、通过对叙事诗的艺术分析,总结了一些有价值的叙事诗的创作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我国诗歌理论在这一方面存在的欠缺。

竟陵派的崛起,在当时文坛产生了热烈反响,这从钱谦益的描述中可见一斑。《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云:

伯敬少负才藻,有声公车间,擢第之后,思别出手眼,另立幽深孤峭之宗,以驾馭古人之上,而同里有谭生元春为之应和,海内称诗者靡然从之,谓之钟谭体。……数年之后,所撰《古今诗归》盛行于世,承学之士,家置一编,奉之如尼父之删定。

然而谁曾料到,相隔仅数十年之后,啧啧的赞美声为一派声势浩大的讨伐浪潮所淹没。钱谦益、顾炎武、王夫之、朱彝尊这些卓然大家都无不以抨击钟、谭为能事,其他应声式的骂詈更是遍地皆闻。当然也有人讲

过:“《诗归》不必定在焚弃之列”,钟惺“论诗颇有合处”^①。“彼所见如室中窥日,明虽不多,景非假借,故《诗归》论谛,亦有可算”,对“攻瑕者将并没其好”表示不满^②。这些话虽然对钟、谭文学理论内容的揭示和价值的评判并未提出多少新的见解,但在当时普遍否定竟陵派的形势下,这种比较持平的话几乎是凤毛麟角,因而也就显得可贵。解放以后,在我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竟陵派是一个长期遭受冷漠的角落,这似乎是它结束了在晚明文坛上长达三十年之久的风靡期以后,即遭到众人严厉鞭挞而立刻归于消沉、并从此一蹶不振命运的一种延续。然而冷漠无助于学术研究的推进。对于像竟陵派这样一个在晚明文学史上曾产生过较大影响的流派,我们首先应当正视它在文学史上的存在,然后对之开展广泛的研究,并作出妥适的评价。这才是一种负责的态度。

① 高亮《与汪次舟书》,引自周亮工编《尺牍新钞》二集卷九。

② 毛先舒《诗辩诤》卷四“竟陵派解驳议”,引自郭绍虞主编《清诗话续编》。

二、竟陵派同志录

“竟陵派”一词较早见于卓尔堪《明遗民诗》卷十朱之臣小传，清张贞生《顾西巘诗集序》也称“竟陵之派”。它是晚明时期一个具有鲜明特点并产生广泛影响的诗文创作和诗文批评流派，以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领袖，由当时一批志趣相投的文人共同组成。

这一文学流派在钟惺中进士（万历三十八年，1610）以后开始逐渐形成，并趋于壮盛。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钟提学惺》里说：钟惺“擢第之后，思别出手眼，另立幽深孤峭之宗，以驾馭古人之上，而同里有谭生元春为之应和，海内称诗者靡然从之，谓之钟谭体。……数年之后，所撰《古今诗归》盛行于世，承学之士，家置一编，奉之如尼父之删定”。《诗归》基本成书是在万历甲寅、乙卯（1614—1615）之间，首次刊印于丁巳（1617），此书将竟陵派的名声传得更加远广。钟惺《潘穉恭诗序》一文作于万历庚申（1620），里面谈到：“稚恭之友戴孝廉元长者，序穉恭诗，忧近时诗道之衰，列举当代名硕面曰：‘近得竟陵一脉，情深宛至，力追正始。’竟陵不知所指。或曰：钟子，竟陵人也。予始逡巡踟躇，舌折而不能举。近相知中有拟钟伯敬体者，予闻面省愆者至今。”文中提到“竟陵一脉”为人所张扬正是该派最得势时的情况。竟陵派首挫于钟惺病逝（1625），再挫于谭元春去世（1637），以后虽仍有人继续向慕其风尚体格，毕竟已是残响余声，不再形成气候。由上可知，竟陵派盛行的时间大约三十年左右（在此期间，它的影响经历了由弱而强，再由强而弱的变化）。在多变的晚明文坛，一个文学流派能将自己的影响持续如此之久，已属不易。

竟陵派除钟惺、谭元春两人外,究竟还包括哪些成员?历来并无一致的说法,也从来没有作过具体统计。事实上,文学史上像竟陵派这样松散、无组织、广义的文学流派,其成员是较难确定的,更难一一列出名单。下面,我以前人比较流行的看法为主要依据,并以明显自觉接受钟、谭影响,在欣赏趣味和创作倾向上与钟、谭有较多一致,作为两条基本原则,列出竟陵派主要成员名单,并对他们作一简要介绍,以供对该派有兴趣的同仁作参考。须说明的是,其中有些成员的创作倾向和文学观点并非自始至终与钟、谭保持一致,或原先不属一路,或后来出现改变,或二者兼而有之。但是,他们文学生涯中的一段主要经历,是与钟、谭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仍不妨称之为竟陵派成员。

钟惺(1574—1625),字伯敬,号退谷,别号退庵,晚年潜心佛典,发愿受戒,取法名断残。祖籍江西永丰,明武宗正德中始迁至竟陵。生父钟一贯,曾任江苏武进县训导。嗣父钟一理,号裕斋。钟惺在万历十九年(1591)为诸生,时年十八岁。三十一岁中举人,三十八岁中第十七名进士,与钱谦益同年。授行人八年,出使四川、山东,典试贵州,改授工部主事,终因党派纷争的关系,遭人抑扼,未受重用。后任南京礼部仪制司主事,转祠祭司郎中。天启元年(1621)升福建按察使僉事提督学政,次年三、四月入闽,考校兴化、延平、福州三府。同年生父去世,丁忧去职。接着遭人弹劾,服阙居家。天启五年(1625)病逝家中^①。主要著作有《隐秀轩集》、《钟伯敬先生遗稿》、《史怀》等,与谭元春共同评选《古诗归》、《唐诗归》(合称《古今诗归》或《诗归》)。其他署钟惺评点的书甚多,真假掺杂,然其中绝大部分书乃属他人盗名之作,未可遽信。竟陵派以钟惺、谭元春为核心,而钟惺实又为该派的灵魂。钟、谭两人在该派中有主次之别是前人通常的看法,《列朝诗集》仅将谭氏附见于钟氏之后,王夫之虽然认为谭氏才力高于钟氏,也说:谭氏“善其(钟惺)近己,翕然宗之”^②。《诗归》是竟陵派诗学理论的一部代表作,是由钟惺、谭元春通力合作完成的,而钟

① 关于钟惺的卒年,以前出版的多种文学史及工具书往往误载为1624年,对此,李先耕先生《钟惺卒年辨证》一文已予纠正(文载于《文学遗产》1987年第6期)。

② 《明诗平论》卷七,谭元春《安庆》评语。

惺实是合作的主要一方^①，此为确认钟惺是该派最重要的领袖提供了一个例证。钟惺自己说，他早岁的创作不离“肖古”，后来又“舍所学”而去附从“复古者”和“笑人泥古者”，前者指受七子影响，后者指受公安派影响。“庚戌以后，乃始平心静气，虚怀独往，外不敢用先人之言，而内自废其中拒之私，务求古人精神所在。”^②中进士一年开始，他才逐渐摆脱了以上两派羁继，真正确立了自己的文学观。可见钱谦益“擢第以后”另立诗宗论断之的当。

谭元春(1586—1637)，字友夏，号鹤湾，别号蓑翁，天启元年(1621)为贡生，七年(1627)应乡试第一。后来，与其弟谭元声、谭元礼、谭元亮一起参加复社。崇祯十年入京应试，殁于途中的一家旅店。著有《谭友夏合集》等。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与钟惺结交。他在《丧友诗三十首·引》里说：“予与钟子交，……起万历乙巳(1605)。”当时钟惺三十二岁，谭元春二十岁，正值一生中进取心最为劲锐的年华。他早年写诗也走单纯学古一路，据他《序操缦草》回忆，开始摹拟“选体”，后来“回翔于古诗、近体之间”。当钟惺逐渐确立自己的文学观时，谭元春大致也完成了创作思想的转变，这为后来他们合作评选《诗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谭元春在竟陵派中的地位和作用除了与钟惺一起鼓吹声气、开启诗风之外，还突出表现在他后期对竟陵派流弊的自我修正。他在《环草小引》里一而继续肯定“诗固幽深之器”，一而又严厉批评了诗歌“幽近寒，深近鬼，高流饥病，又求至于寒与鬼而后止，往往堕而不悟，悟而不悔”的创作倾向，其态度、措词几于钱谦益无多差别。

蔡复一(1576—1625)，字敬夫，号元履，福建同安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历湖广参政，总督贵州、云南、湖广军务，兼巡抚贵州，卒于军中，谥清宪。著有《遁庵集》。《明史》卷二四九有传。蔡复一先与钟惺结识，后通过钟惺推荐又识谭元春。钟惺《报蔡敬夫大参》：“吾邑谭元春字友夏者，异人也，比于某真所谓十倍曹丕，……今寄其《简远》、《虎井》二集，当自知之。谭生今年二十六，尚为诸生。”蔡、谭见面当在此以后。谭

① 关于钟惺、谭元春合作评选《诗归》的具体情况，详见《〈诗归〉成书考》。

② 见钟惺《隐秀轩集自序》。

元春自称“师事”敬夫^①，敬夫则敬惜元春之才，作诗多从其学，钱谦益曰：“（蔡敬夫）宦游楚中，召友夏至门下，尽弃所学而学焉。”^②“尽弃所学”倒未必，学谭氏作诗却是事实。仕宦而甘心师事布衣，这也算是文坛一桩佳话。钟、谭、蔡三人诗文之交极为密洽，谭元春《环草小引》曰：“古诗人未有无倡者。蔡、钟二公在日，每有诗文，率千里封题寄观。”他还给予蔡复一的创作较高的评价，说：“其古可及，其独不可及。”^③他们不仅写了很多酬答唱和的诗篇，还通过书信经常切磋诗文创作之道。钟惺、谭元春评《诗归》，曾将初稿本寄给蔡敬夫，听取他的意见。蔡敬夫阅稿后即写信给钟、谭，提出“《诗归》中有太尖而欠雅厚者，宜删去一二。”^④“去取有可商处。”^⑤这是对《诗归》最早的批评意见。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十六“蔡复一”曰：“景陵之邪说行，率先倒戈者，蔡敬夫也。”立论不无原因，但是把他们在个别具体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称为“倒戈”则属夸大其词，实际上，蔡复一对该书总体是赞赏的，他说：“吾读钟伯敬、谭友夏所定《诗归》，而于乐若有会。”^⑥他与钟、谭的合作和友谊一直保持到生命的结束。《诗归》初稿完成后，又经过钟、谭多次修改，在修改中，他们吸取了蔡复一的一些意见，刊印的《古诗归》收录了蔡复一的两条评语（分别见于卷六《李陵录别诗八首》和卷七曹操《短歌行》），这是此书绝无仅有的例子，可见钟、谭对蔡复一的高度重视。可以毫不夸大地说，除钟、谭外，蔡复一在竟陵派中地位最为突出。他的《寒河集序》一文是阐述竟陵派诗歌主张的重要文献，下面两个观点最可注意：一、“诗乐合一”、合符“自然”。就论点本身来说，它们并不能算新鲜，但他讲“诗乐合一”，把重点放在“清音”、“幽感”上而；讲“自然之徵”而强调“人之所宜，不若其所未宜；传送之直寻，或不若依寓之隐约”，使传统的诗歌命题与竟陵派幽深孤峭之旨建立了联系。二、反对片而“摹古”或“运我”。他说：“一以为摹古，一以为运我，皆

① 《跋乐至知县蔡先生传》。

② 《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谭解元元春》。

③ 《蔡清宪公全集序》。

④ 见谭元春《奏记蔡清宪公四》。

⑤ 见钟惺《再报蔡敬夫》。

⑥ 蔡复一《寒河集序》。

然矣，而皆未然。”这与钟、谭关于文学创作要做到信心与信古相结合的主张是相一致的。

朱之臣，字无易，号菊水，四川成都人。万历中进士，守德安，官江西右布政使。中蜚言入狱，后得释。累官至南京左侍郎。明朝覆亡后，退隐金陵，不见宾客，自号青樵老人。年九十卒。著有《梅龙集》。朱之臣识谭元春也是通过钟惺介绍，康熙刻本《安陆府志》卷二十《文苑列传·谭元春传》云：“闽蔡敬夫、蜀朱无易官于楚，其知公（指谭元春）虽因退谷，而公之诗文行谊自足以致二公。”谭元春虽出朱之臣门下，朱氏之创作却以受影响于谭元春为多，情况略似蔡复一。康熙刻本《天门县志》卷十一《人物志》称钟惺、谭元春、蔡复一、朱之臣数人“鸣和往来，称神交焉”。卓尔堪评朱之臣“诗多人竟陵派”。朱氏曾刻行谭元春诗集《退寻草》和《寒河集》，又替《寒河集》作序，鼓吹竟陵，不遗余力。他论诗大端重情韵，求创新，《寒河集序》云：“夫诗道最为情韵，情之所至，乃能日新而不可穷。然惟绝有情人，为于音影之外，别具英变，以转未坠之线。故情不能至，诗亦不至焉。”又云：“今夫诗情之死也久矣！先是于鳞辈专任浮响，如土鼓之不韵。中郎于是以趣救之，今揽其笔味，正得嫣然蔚然耳。李北海云：‘似我者拙，学我者死。’中郎之所谓趣，任彼法孤行可也。”对钟惺、谭元春于两派之外另辟新径表示赞同。朱之臣在这篇文章中还指出：“友夏于伯敬，绝无阿格，‘我所必起，人不能废。’友夏自道矣。”肯定同一派内部的不同成员也需要保持个性和创新精神，识见不俗。

徐波，生于万历庚寅（1590）。钟惺《程惟德诗序》讲他序徐波诗时在万历己未，《徐元叹诗序》云“元叹今年三十耳。”生年据此推知^①。卒年不详^②。字元叹，江苏吴县人。少年任侠，工诗文，究心内外典。马士英擅政，将以清职罗致元叹，竟拂衣而去。明亡后，归老落木庵，以枯禅终。著

① 朱隗《明诗平论》二集卷七录有徐波七古诗《申月》，其序云：“吴中数十年来，盛传楞伽山八月十八夜申月，余年三十七矣，未尝一见。……今岁丙子，秋字澄霁。”“丙子”为明崇祯九年（1636），上推其生年为1590年，与钟惺所记合。

② 钱谦益《有学集》卷十《徐元叹劝酒词十首》作于顺治十六年（1659），之一：“皇天老眼慰蹉跎，七十年华小劫过。天宝贞元同客尽，江东留得一徐波。”卷十三《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作于康熙二年（1663），之四十一：“永明百卷丹铅约，少待春灯烂漫红。”原注：“怀落木庵主。”据此，徐波七十四岁时尚在世。